

# 中国青年研究热点议题与学术启示（2024）

■ 张志安 龚沈希

**[摘要]**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青年发展有了更加多元的面貌,青年研究也日趋丰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为青年研究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也为青年研究如何顺应新形势和新要求设定了更高标准。文章尝试以具有启发意义的热点议题为切入视角,勾勒2024年国内学界关于青年研究的知识版图。通过研读筛选中文主流期刊的研究论文,将当下青年研究关注的重要领域概括为八个主题:青年研究的基础理论、青年就业、青年婚恋与家庭、青年流动与社会融入、青年教育、青年媒介使用、青年社会心态与观念、青年工作与政策。在此基础上,从强化核心概念的使用规范、保持鲜明的经验取向、拓展经典范式的问题域等方面提出建议,希望对青年研究的深入推进有所裨益。

**[关键词]** 青年; 青年研究; 研究热点; 学术启示

中图分类号: C913.5; D66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780(2025)01-0016-11  
DOI: 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25.01.002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sup>[1]</sup>。青年是全面推进强国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和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主力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迅猛发展,青年发展的前途命运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密不可分。《决定》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重点部署了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举措。这些举措与青年发展息息相关,既为青年研究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也为青年研究如何顺应新形势和新要求设定了更高标准。

本文以研究问题、观点视角、论证方式等方面具有创新性为标准,对2024年度发表于主流中文学术期刊上的青年研究论文进行筛选和分析。通过聚类整合,文章最终形成青年研究

**基金项目:** 复旦大学2022—2023年度人文社科青年融合创新团队项目“数字劳动的发展困境及治理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IDH3353068)。

**作者简介:** 张志安,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龚沈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

的基础理论、青年就业、青年婚恋与家庭、青年流动与社会融入、青年教育、青年媒介使用、青年社会心态与观念、青年工作与政策等八个专题，以此来呈现我国青年研究的最新理论动态、热点议题的变化趋势。

## 一、青年研究的基础理论：知识体系与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我国青年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作为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青年研究聚集了一大批跨学科的研究者。多样化的学科视角、宽领域的经验材料以及日臻深入的本土化问题意识，使得青年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当前青年研究的一大遗憾之处在于，其在基础理论构建方面尚未形成具有足够创新性、代表性、全局性的研究成果。

青年研究领域的“百家争鸣”仍存在短板。近十年来国内青年研究领域的关键话题主要包括青年价值观、青年国家认同、共青团等；重点研究对象包括大学生、青年女性、农村青年。与前三十年相比，近十年的青年经验研究更多地把青年看作是一个整体，习惯用抽象的、概念化的论述性研究来分析青年，对青年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关注不足，经验性研究的比例相对较低<sup>[2]</sup>。要推动青年研究基础理论的发展，必须依托于更高质量的经验研究。然而，学者观察发现，当前青年研究领域的经验研究多数只是浅表的统计分析或故事白描构成的“事实性真实”，只有部分能够挖掘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和作用机制的“社会性真实”，更缺少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凝练出标识性概念、用概念统摄现象的“阐释性真实”。经验研究在借鉴西方理论研究中国青年的各方面时，要保持理论自觉，用历史视野和历史思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研究基础理论<sup>[3]</sup>。

虽有上述不足，但不可否认学者在推动基础理论创新上的探索与努力，形成了一些新概念和新成果。例如，有学者将生命周期理论和生命历程理论的基本概念结合到青年发展问题的具体分析上，提出了“全生命周期青年发展”的理论创新议题，主张针对青年成长轨迹中不同阶段，分析青年发展问题的阶段性规律、需求和优势<sup>[4]</sup>。他们希望，以全生命周期青年发展为指引，综合系统地分析青年发展的现实议题，帮助完善前瞻性、系统性和连续性青年发展政策。全生命周期视角下青年发展的主要现实议题包括青年就业、青年教育、青年健康、青年社会保障、青年文化、青年婚育、青年备老等。

此外，一些扎根中国青年本土经验提炼出的理论概念，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经验研究中。2023 年，项飙曾对当代青年生存和发展中出现的诸多现象和问题，作出了“重建附近”和“悬浮”等概念化的总结<sup>[5]</sup>。这些概念出现在 2024 年发表的一些青年研究成果中，用以解释飞盘体育社群、“抱树”、城市漫游等新兴青年现象。不过，这些新兴青年现象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拓展，需要在阐释经验现象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并强化这些概念的学理意义。

## 二、青年就业：新质生产力的机遇与挑战

新质生产力为研究解决青年就业问题注入了新的活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高质

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sup>[1]</sup>，“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在产业层面，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变革势必对就业市场产生深远影响。本年度，学界围绕新质生产力，对“缓解青年结构性就业矛盾”“促进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等两个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

相比于过去的生产力变革，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似乎更具颠覆性。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推动人类社会从体力自动化转向脑力自动化。体力自动化技术主要影响第二产业；生成式人工智能（脑力自动化技术）对劳动者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主要影响女性、青年群体、专业技能劳动者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sup>[6]</sup>。人工智能发展有利于提高劳动力整体工资水平，但会进一步扩大学历工资差距，高收入群体中的高学历劳动力更有可能从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中获益<sup>[7]</sup>。

新质生产力在多方面为促进就业结构转型提供支持。青年群体获得以创意设计自主性、规划安排自主性、技术运用自主性等为特征的工作自主性<sup>[8]</sup>。不过，政策制定者仍需注意其在缓解青年失业问题上的局限性。以人工智能为例，在工业机器人的产业替代进程中，通过对临退休年龄员工的替代，青年失业率显著降低；然而，失业回滞现象和“机器换人”的不可逆性会部分抵消人工智能对青年就业的正向影响<sup>[9]</sup>。

在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新兴行业，青年就业质量有待提高。相比传统行业，新兴行业青年虽然有可能获得更加灵活的就业形态，让兴趣所长有更多的展示甚至变现的空间，但也常会面临着社会保障的不稳定性和职业技能发展的非持续性问题。学者研究发现，新兴青年的工作流动性和失业风险感知都显著高于传统行业青年<sup>[10]</sup>。具体到平台经济领域，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结合形成的数字化生产方式引致生产主导权的变化，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劳动分工与管理模式、劳资权力博弈关系以及利益分配关系都经历了变革。因此，与之适应的劳动者就业治理机制与思路也应当进行更新升级<sup>[11]</sup>。

当前，我国青年的就业状况中仍存在一些与新质生产力要求不相适应的方面。学者指出，体制偏好与体制内就业难、灵活用工增速下降、慢就业所导致的推迟就业人员集中返回劳动力市场等就业新特征，以及经济恢复缓慢、就业岗位不足，毕业生创新高、青年劳动力供给增多，青年人才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错配等外部失衡，共同推动青年失业率持续攀升<sup>[12]</sup>。此外，学者也注意到，高学历青年群体的就业选择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存在一定偏差。例如，研究生群体受经济环境和个体成长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在选择就业时偏好“编制”、安逸的环境、“高性价比”的薪酬<sup>[13]</sup>。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宏观背景下，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青年就业，如何使青年就业反哺于新质生产力发展，这些问题还需要更多后续研究跟进。

### 三、青年婚恋与家庭：家庭代际伦理变迁

当代青年的婚恋和家庭观念正经历着显著变迁。研究显示，青年人的恋爱观趋于自由化，恋爱动机从以婚姻为目的转变为以情感为目的，亲密关系的形式更加自由，性观念更加开放；

青年人的婚姻观趋于自主化，传宗接代的观念淡化，青年离婚观念更加开放，单身主义、不婚主义等多元婚姻观念兴起<sup>[14]</sup>。与家庭相关的青年热点现象成为时下研究者争鸣的焦点。

青年不爱走亲戚、不愿费精力维护亲戚关系的现象被称为“断亲”。从中国家庭亲属关系现代化的角度看，“断亲”作为一种生成于社会个体化进程中的家庭生活模式，暗含着青年对待亲属关系的实用主义逻辑和风险策略<sup>[15]</sup>。处于社会流动中的青年离开了原本的亲属网络，新的人情往来和面子需求使他们在自己的生活或事业领域重建自己的社会网络<sup>[16]</sup>。但也有学者提出，“断亲”并不是家庭伦理的解体，而是新的家庭伦理关系正在生成，核心家庭在年轻群体的精神生活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sup>[17]</sup>，不应仅凭“断亲”现象就把青年看作是缺失文化认同和亲情归属的“无根一代”<sup>[18]</sup>。对于“断亲”现象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仍需要更多经验证据<sup>[19]</sup>。

暂未就业的青年回到家庭与父母生活，通过一定的劳动换取父母的经济支持，这一特殊的家庭代际实践被称为“全职儿女”。“全职儿女”现象因何产生？一方面可能是青年自我矛盾困惑而感到无所适从心态的被动选择，也可能是个体意义重塑后怡然自得的主动选择；另一方面，“全职儿女”也可能是逆卷而行下基于家庭内部协商一致的个性选择，是强烈的家庭互助需求以及期望的结果<sup>[20]</sup>。学者提出，“全职儿女”这一代际互惠实践，再造了家庭关系中“亲”的伦理，强化了代际团结与个体抗逆力，为深度老龄化社会维系代际间“反馈模式”提供了参考<sup>[21]</sup>。如何从“全职儿女”现象出发，进一步探讨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在社会经济压力和青年成长压力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和功能是值得重点关注的议题。

彩礼和嫁妆是观察青年婚恋实践中代际伦理变迁的一个窗口。理论层面，研究者提出使用“支付—契约”的双重分析框架，把中国农村的彩礼支付实践可分为弱支付—弱契约、强支付—弱契约、强支付—强契约、弱支付—强契约这四种类型。其中，支付属性越强，对婚姻规则的冲击越大；契约属性越强，对婚姻缔结的积极作用越大<sup>[22]</sup>。经验层面，相关研究展示了彩礼和嫁妆在具体实践中的丰富内涵。在重庆农村新生代青年“零彩礼”的个案中，完全货币化的彩礼因为功利化特征而被排除在有意义的婚姻交换之外<sup>[23]</sup>。在湖北农村“倒贴彩礼”的个案中，高额嫁妆在传统社会价值之外，还有在熟人社会中重构成员身份内向认同的符号价值<sup>[24]</sup>。而城市中产阶层家庭的高额嫁妆承载了女方家庭代际一体的财产联结关系与父母婉转而强烈的“女儿养老”期待<sup>[25]</sup>。

青年女性的婚恋和家庭实践正在重构个体与家庭的权力图景。在一些地区甚至普遍出现了“并家婚”“两头婚”等新婚姻形式，传统父权制家庭发生了变革<sup>[26]</sup>。独生女婚后与父母在双向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以女儿为中心的情感共同体，“闺女家”替代了传统意义上“娘家”的权力角色，家庭的重心与联结过渡到女儿，女性个体呈现出双重主体性的上升——在代际关系中作为女儿以及在夫妻关系作为妻子<sup>[27]</sup>。农村青年女性“做女儿”的处境略有不同：一方面，女儿养老逐渐成为农村家庭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选择，农村家庭从传统的伦理型代际关系转变为现代的实践型代际关系；另一方面，尽管经济发展和教育普及确实可以为女性赋权，但农村青年女性“做女儿”的实践仍深受原生家庭中的传统性别观念影响<sup>[28]</sup>。

#### 四、青年流动与社会融入：“都市—县域—乡村”三元结构

随着新一轮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县域日益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空间。青年人口流动问题的城乡二元结构也逐渐扩展为“都市—县域—乡村”的三元结构。无论是数字游民“下沉”县乡，还是农村青年从都市转向县域，都极大拓展了青年流动的问题域。

“数字游民”的本土情境在学者的追问中变得明朗。数字游民主动放弃确定性的生活，重视体验，追求舒适的地方、自在的节奏，在具体实践中积极寻求数字游民社区的支持<sup>[29]</sup>。青年希望通过数字游牧来实现现代工作制度与消费主义的双重革新；然而“数字游牧”生活是短暂的，数字游牧身份仅仅是彰显个性的符号物，这种革新仅停留于象征性；数字游牧社区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共同体，数字游牧社区目前更适合作为一种旅游消费<sup>[30]</sup>。

那么数字游民能否融入地方社区？不同的田野经验得出了差异化的结论。有学者结合浙江的田野经验认为，数字游民实现了从“游走”到“入乡”的转变，他们主动将个体价值的实现与乡土发展愿景相绑定，成为推动乡村建设的地方性力量<sup>[31]</sup>。持相反意见的学者指出，数字游民本质上是一个互联网产品，青年与乡村很难有深刻的互动，需要地方数字游民项目的运营方进行本土化调适。例如，学者通过观察光山数字游民社区的个案，展现了政府、运营方与数字游民等多主体互相型构的过程，表明社区和数字游民需要在城乡之间找准定位才能实现项目落地<sup>[32]</sup>。

另有尖锐批评质疑数字游民热潮的真实性。国内数字游民是否形成规模化并非不证自明，即便在学界至今依然缺乏科学严谨的调查研究；看似热闹的数字游民身份话语之下，存在着大量非标准化数字游民群体，数字游民的规模和影响力在各方行动者的利益争夺与协商建构中被有意放大<sup>[33]</sup>。

县域为青年流动提供了新的选择，但并不是没有障碍和风险。就业对于农村青年及其核心家庭的“向上流动”至关重要。绝大部分县域城市缺乏在地化就业机会，青年难以获得稳定的收入支持。青年从都市回到县域，由于地方缺乏规模化的企业，只有体制内的就业岗位能满足其对“稳定”和“体面”的需求<sup>[34]</sup>。

在县域生存的农村青年为应对就业和家庭支付的压力，成为了兼具县城和乡村两种要素的“县乡两栖者”，塑造出了新的“一家三制”家庭形态<sup>[35]</sup>。农村青年在县域城市组建家庭后，会不同程度地面临家庭与工作关系处理的压力。同时，随着越来越多农村青年将家庭再生产安排从农村转向县域城市，受此影响的乡村进一步空心化，客观上加剧了乡村的发展困境<sup>[36]</sup>。

#### 五、青年教育：破解优绩主义陷阱

“优绩主义”（meritocracy）将勤奋伦理与社会公平相对应，倡导将社会中的物质财富和政治权力基于“功绩”分配。优绩主义主张人们只要具备才能并愿意勤奋努力，就能够获得财富与地位上升机会。过往研究对中国教育体系中的优绩主义逻辑有所关注，本年度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更深入地反思了优绩主义给青年教育带来的负面后果以及克服方式。

青年教育的“内卷”困境与“孔乙己”焦虑都与优绩主义有关。伴随我国高等教育扩张进程，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失配现象日渐凸显。学者通过使用2015~2023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SCUS）数据，发现近10年大学生就业意愿总体上呈现多元化选择趋势，同时也体现出“升学内卷”和“体制内卷”的特征<sup>[37]</sup>。对于未能获得理想工作的高学历青年而言，“努力学习就有回报”的优绩主义愿景破灭，并产生了“内卷”与“躺平”的矛盾心态，焦虑、逃避等成为大学生的心态表征<sup>[38]</sup>。

“寒门贵子”“小镇做题家”的境遇更具特殊性。由于家庭文化和社会资本的相对匮乏，他们面临经济和外部期许压力，更容易因自身无力突围产生自卑感。青年教育问题中的优绩主义陷阱实质是个人主义归因偏误，以“能力+努力=成功”掩盖出身和运气的影响。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下，家庭情境较差的青年在“先赋应得”观念的影响下，往往肯定他人出身和运气的先赋性秩序，进而强化自身的“先赋性动力”——改变命运的精神动力和自我奋斗意识，在优绩主义陷阱中背负更加沉重且隐性的文化代价<sup>[39]</sup>。

被优绩主义逻辑所摒弃的“绩效外能力”，实际上对青年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青年教育的内容被研究者重新审视。在高等教育领域，就业能力管理往往为高学历农村青年所忽视，他们在校期间采取“随波逐流”的能力建设策略，毕业后才意识到自身能力管理策略上的失误，“后知后觉”以就业为导向培养能力的重要性<sup>[40]</sup>。在青少年教育领域，优绩主义逻辑对知识的窄化界定和过度传授有碍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形成教育程度越高相关能力越弱化的“教育悖论”<sup>[41]</sup>。立足青年未来发展的全局，当下青年教育在内容上存在情感教育短板，而情感在人工智能时代是一项重要技能；青年教育应该转向情感教育变革，关注交往能力、强调创造能力、提高适应能力<sup>[42]</sup>。

家庭教育中的优绩主义逻辑亦不容忽视。随着教育“内卷化”的升级，家长教育焦虑从高中阶段下沉至义务教育阶段进而下沉至学前教育阶段。幼儿家长从“娃娃”开始就对孩子寄予了超高教育期待，教育投入远超家庭承受能力，导致教育竞争无限下移<sup>[43]</sup>。同时，我国家庭教育进入全面迅速发展时期，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家庭教育竞争“内卷化”现象日趋严重，加剧弱势阶层家庭的经济压力，社会底层家庭可能会因此对教育失去信心<sup>[44]</sup>。

## 六、青年媒介使用：数字亲密关系与情感表达

数字技术已深度融入青年群体的社交习惯之中，并且深刻影响着他们构建亲密关系的方式。以往研究对“数字亲密关系”中的技术角色多持批判性态度，倾向于揭示数字技术对情感、关系、交往沟通的异化作用，青年在数字亲密关系中的主体性则有待挖掘。

以网络平台的相亲为例，直播相亲为青年群体提供了自我展示和相互连接的机会，是深度媒介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媒介与当前社会婚恋实践及其背后社会语境相互建构的动态过程，但也直言，直播相亲并不能解决当代青年群体的婚恋困境<sup>[45]</sup>。

此外，作为最前沿的数字技术之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数字亲密关系的影响在2024年受

到更加强烈的关注。相关经验研究提出“自主生成式亲密关系”的概念，用以表述智能时代情感消费的新形式。在自主生成式亲密关系中，青年通过训练智能体（人工智能伴侣）、调整预期和转换角色等策略主动控制与人工智能伴侣的亲密程度，最终形成了与智能体退出互动、间断互动和持续互动三种结果<sup>[46]</sup>。亲密关系成为情感消费的对象甚至可能被人工智能替代，这是人类自主性的体现还是一种新的异化形式，值得进一步讨论。

情感表达是青年媒介使用的一大核心内容，互联网“发疯文学”正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也引发了学者的研究兴趣。学者指出，“发疯文学”呈现为极端的言论表达和激进的情绪状态，青年借由“发疯文学”宣泄生活中的负面情绪，追求短暂的精神安宁与胜利，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青年根本性的情绪危机<sup>[47]</sup>。青年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与之密切相关。

青年网民的情绪表达也是社会公共治理课题。突发事件与网络舆论的相互作用易引发青年网民情绪的激化，可能诱发重大网络舆情危机，为网络空间的公共治理带来风险和挑战。学者也在尝试通过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青年网民情绪传播机理进行模型分析，可以为数字化时代有效治理网络舆情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sup>[48]</sup>。

## 七、青年社会心态与观念：国家与个人的立体图景

社会调查是研究青年社会心态与观念的核心手段，也是获取经验证据最重要的来源。基于相关调查数据的分析，可全景式了解和把握青年价值观和社会心态。2023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显示<sup>[38]</sup>，“00后”大学生存在集体焦虑，他们高度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但对生活和个人发展前景感到迷茫困惑，而这一集体性焦虑源于当代大学生学业和就业“内卷”竞争的现实处境。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远大理想”和“使命担当”与青年群体面临的学业和就业选择形成了观察青年社会心态的两面。

“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2009—2021）”数据表明<sup>[49]</sup>，青年群体在国家发展认知上以高政治认同和温和民族主义为特征，在个人发展认知上强调经济独立和独特的生命进程体验。国家发展与个人发展关系二者间存在的张力，集中体现在社会流动下降后青年群体主观认知矮化、新物质匮乏下产生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价值观念和经济利益衡量下代际冲突的不同实践面向。如何协调二者间的张力，是积极引导青年社会心态面临的治理挑战。

在整合分析“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15—2020）”基础上，学者提出青年社会心态的九组悖论<sup>[50]</sup>：政治认同高涨，但拒绝盲从政府；要求社会秩序，也要求个人自由；有大局意识，又反对国家兜底；对国家发展前景积极乐观，个人短期目标迷茫焦虑；社会评价整体走高，年轻组别个人生活满意度略有降低；相信奋斗，却对现实生活缺乏掌控感；重视物质条件，又轻视功名利禄；支持市场竞争，也追求结果平等；认同财富彰显成就，却对资本态度冷淡。学者认为，上述观念根植于“以己观世”的认知结构。青年群体总是从个人的预期、价值、经验、感知（“己”）出发，观照那些先验的、外在的、强制的权力结构和社会规范（“世”），“己”与“世”平等与否决定了社会心态如何差异化呈现。

此外，青年群体在使用互联网方式上的差异性也会影响其社会心态。研究者发现，当代

青年群体互联网使用类型主要包括基础型、发展型和全方位型三种<sup>[51]</sup>。超过半数的青年群体属于发展型的使用群体，不存在不进行任何互联网活动的青年群体。使用互联网方式上的差异直接影响到青年群体的阶层流动预期，平衡且多元的互联网使用，有利于培养青年群体更为积极的社会心态。

## 八、青年工作与政策：前沿探索与工作进展

党的重大工作部署引领青年工作研究的方向，尤其是青年发展如何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成为了青年工作与政策研究的关注重点。学者认为，青年发展与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存在密切关联，必然会受到党和国家重要会议的影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战略部署，从马克思主义青年发展理论看，将从青年发展制度、青年发展领域、青年发展措施等三个层面对青年发展产生影响<sup>[52]</sup>

另外，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下，前沿科技如何更好地服务于青年工作也成为本年度学者重点研究的议题之一。学者认为，文化记忆建构策略或许可以成为新传播技术条件下青年价值观建设的一个根本方法<sup>[53]</sup>，通过整合运用视觉图像、数字媒介等现实化组织形式，可以发挥数字记忆的价值观形塑和政治认同作用，以凝聚青年共识。此外，学者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传播提供了新动力、新机制和新机遇。在具体实践中，则需要辨析内容真实与版权归属、增强内容叙事原创性生产，同时注重文本内容生产的创意性、避免同质机械化输出，还要警惕技术或流量崇拜、确保文化产品叙事创新的理性价值<sup>[54]</sup>。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青年研究有了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日趋深入地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就业理论与西方就业理论的准自然实验，发现“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提高共建国的劳动力质量、提高就业需求数量等促进了参与国青年群体的就业<sup>[55]</sup>。此外，学者认为，为适应新时代党领导青年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需要，党的青年工作应当同党的对外工作有机结合，具体把握党的青年对外工作新格局构建的结构、内容和组织，从价值、机制、组织、主体等四个方面来制定新时代党的青年对外工作战略<sup>[56]</sup>。

## 九、结语与启示

总体上，青年研究的基础理论在学界的受关注度日益增长。当下，青年研究如火如荼，青年现象层出不穷，为解释这些现象而创造的新概念更是眼花缭乱。但是，如果没有基础理论支撑，理论概念的创新往往只能流于文法和修辞。青年研究要想克服“概念的审美疲劳”，尤其需要从发展基础理论上下功夫。

青年就业问题在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正处于各方关注的焦点。2024年9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8.8%，较上月提高了1.7%，创下2023年12月失业率统计调整后的最高纪录。青年群体的“就业难”已经来到了历史性关口。这意味着青年就业问题亟须新思路、新力量和新方法破局。新质生产力为解答有关问题提供

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新质生产力如何影响青年就业是值得未来长期关注的议题。

青年教育本应成为青年就业的支撑，然而青年教育与就业的结构性失配却是当下的社会现实。学界对青年教育问题的反思从未停止，“优绩主义陷阱”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线索。在持续性的反思过程中，青年教育研究能够更清晰地界定青年教育的宗旨与目标，并深入理解青年群体在受教育过程中现实的痛点、难点以及发展需要。

“青年婚恋与家庭”“青年流动与社会融入”展现了青年群体的生活变迁。传统研究视角中的独生子女长大成人，或是组建形成了新一代的核心家庭，或是取代父母成为原生核心家庭的中心。“城市化的孩子”不再单向地朝都市流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尝试在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寻找发展机遇。这些领域的新议题并非凭空产生，而是随历史潮流的涨落渐次显现。

“青年媒介使用”“青年社会心态与观念”“青年工作与政策”的部分研究议题出现了重合。“青年社会心态与观念”“青年工作与政策”同样关注媒介技术对青年群体价值观念的影响，也同样地关注与政治宣传工作相关的青年政治认同与意识形态。这些议题重合体现了青年研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

统揽 2024 年度国内青年研究的热点议题和知识版图，相比 2023 年度，有关研究议题很大程度上仍然由相似的宏观背景延续而来，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整体上并未发生显著变化。2024 年度引起学界广泛讨论的热点议题，如“断亲”“全职儿女”“数字游民”等，在 2023 年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经零星地出现在学术出版物上。学术界的这种“慢热”，可能由于经验研究需要时间打磨沉淀，本身有一定的滞后性。

在青年研究领域，同“慢热”形成镜像的另一面，是部分往年热点议题的“速冻”。例如，2022 年有大量的论述性研究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建言献策，但在 2024 年度已经很难看到后续研究跟进。青年研究热点议题常常由论述性研究阐述生发，但必须通过经验性研究调查论证才能真正完成知识贡献的闭环。这就需要青年研究领域的主流刊物扮演好指挥棒和把关人的角色。针对青年研究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提出以下三项建议：

第一，强化核心概念的使用规范。青年研究基础理论的薄弱一定程度上源于研究者对核心概念的轻视，概念滥用、滥造的问题屡见不鲜。强化核心概念的使用规范，或可以遏制部分研究者对现象认识分析尚不深入、借概念装点创新性、“隔靴搔痒”的现象。

第二，保持鲜明的经验取向。青年研究始终是一个多学科参与、注重实践性的学术领域。不同社会科学话语在青年研究领域尽管有着密切交流，但在认识论层面尚缺乏共识。应当鼓励研究保持鲜明的经验取向，为青年研究贡献新事实、新知识，而不是用不同学科话语去阐释相近的经验事实。

第三，拓展经典范式的问题域。青年研究的问题域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应当尝试通过引入新的对象来激发经典范式的活力。例如，情感过去被认作是私人的产物，极少被放置于公共性的问题域。数字时代，情感的公共性不断涌现，情感以及与之相关的心理健康问题值得青年研究的系统性关注。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N]. 人民日报, 2024-07-22 (1).
- [2] 风笑天. 近十年国内青年研究的现状及其变迁分析 [J]. 青年探索, 2024 (2): 5-16.
- [3] 张莉. 青年研究的新进展与议题方向——基于近五年国内青年研究期刊论文的分析 [J]. 青年探索, 2024 (5): 61-70.
- [4] 陆杰华, 孙杨. 全生命周期视角下青年发展: 理论、议题及其改革路径 [J]. 青年探索, 2024 (5): 5-16.
- [5] 项飙, 康岚. “重建附近”: 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 ——人类学家项飙访谈(下) [J]. 当代青年研究, 2023 (6): 1-10.
- [6] 张咏雪. 从自动化技术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者影响的技能异质性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24 (4): 69-91.
- [7] 姜琪, 李吉志, 倪硕. 人工智能会加剧学历工资差距吗 [J]. 财经科学, 2024 (6): 61-76.
- [8] 贾文娟. 数字智能时代“Z世代”的工作自主性 [J]. 青年探索, 2024 (1): 43-54.
- [9] 刘金东, 徐文君, 王佳慧. 人工智能对青年就业的影响研究——来自 OECD 国家工业机器人使用的证据 [J]. 中国人口科学, 2024 (3): 3-17.
- [10] 刘琳, 张海东. 工作流动性与新兴青年的失业风险感知研究——基于十个特大城市的数据分析 [J]. 社会科学辑刊, 2024 (5): 137-147.
- [11] 韩文龙, 唐湘. 平台经济的新就业形态与经济关系解构——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 [J]. 学术月刊, 2024 (6): 63-74.
- [12] 张青松, 代伟. 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现实差距与提升路径 [J]. 青年探索, 2024 (4): 82-92.
- [13] 孙荪. 编制取向: 研究生就业偏好及其影响因素探究 [J].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4 (3): 108-117.
- [14] 杨菊华, 史冬梅. 新时代中国青年婚恋观变迁研究 [J]. 青年探索, 2024 (4): 15-29.
- [15] 于志强. 中国式断亲: 当代亲属关系的演变与生活模式重构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2): 94-104.
- [16] 唐甜甜, 翟学伟. “断亲”为何? ——试论中国人际关系的变迁 [J]. 河北学刊, 2024 (3): 167-176.
- [17] 赵刘洋. 从“断亲”现象看变动中的当代中国家庭伦理 [J]. 天府新论, 2024 (3): 23-26.
- [18] 谢龙英, 张茂元, 陈慧姣. “无根一代”崛起? ——数字时代青年“断亲”现象研究 [J]. 青年探索, 2024 (5): 91-101.
- [19] 风笑天. 青年“断亲”: 客观现实抑或虚幻概念? ——兼论系统规范的调查研究 [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 (6): 98-108.
- [20] 宋佳荣, 吴玉荣, 同雪莉. 就业压力下的反向选择: “全职儿女”现象的多维审视 [J]. 青年探索, 2024 (4): 93-103.
- [21] 周恬恬, 苗国. 亲与孝: “全职儿女”的代际关系和行动伦理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 (9): 5-13.
- [22] 牟敏娜. 支付还是契约? 农村彩礼支付实践的类型化研究 [J]. 中国农村观察, 2024 (2): 168-184.
- [23] 张艳霞, 刘远冬. 农村新生代青年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及其现实挑战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 163-180.
- [24] 王处辉, 谢俊杰. 消费社会中农村新婚俗的生成与价值表达探析——基于湖北省 J 县北部“倒贴彩礼”现象的田野调查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1): 97-106.
- [25] 计迎春, 林泽宇, 李璇. 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嫁妆研究——性别规范、孝道伦理和代际关系的杂糅变迁 [J]. 妇女研究论丛, 2024 (2): 16-32.
- [26] 周新成. 当代中国农村多元婚姻形式与代际关系调适——兼论父权制家庭变革的不均衡性 [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6): 104-113.
- [27] 王倩楠. “闺女家”的出现: 女儿与娘家亲密关系的转型 [J]. 社会学评论, 2024 (3): 235-256.
- [28] 杨祖丽, 郑丹丹. 在家庭与性别之间: 农村青年女性的“做女儿”实践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 132-145.
- [29] 解佳, 阳棧昌, 何轩, 等. 液态生活: 数字游民的流动逻辑与实践路径 [J]. 旅游科学, 2024 (5): 41-56.
- [30] 张品, 詹远仪. 意义危机与新部落主义的想象: 青年数字游牧社区研究 [J]. 青年探索, 2024 (2): 36-48.

- [31] 王云龙.从“游走”到“入乡”:数字游民的乡村嵌入与重塑——基于浙江省A县的经验考察[J].中国青年研究,2024(6):68-77.
- [32] 沙垚.流动作为方法:数字游民在中国乡村——以光山数字游民基地为例[J].新闻界,2024(4):28-35.
- [33] 张文娟,张菱珂.未竟的身份:中国式数字游民身份的媒介化制造与协商——基于大理数字游民社群的田野考察[J].新闻与写作,2024(7):76-90.
- [34] 刘畅.“回县青年”县域体制内就业及其成因[J].青年研究,2024(1):67-78.
- [35] 何经纬,曹海林.家庭视角下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形成逻辑及其影响[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120-130.
- [36] 王欧.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再生产与乡村发展——基于打工地和输出地的城乡多点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51-171.
- [37] 刘保中,臧小森.多元化与内卷化:大学生就业意愿变化的趋势分析(2015-2023年)[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21-33.
- [38] 李春玲,高云浩.学业和就业竞争压力下大学生社会心态特征——基于2023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分析[J].青年探索,2024(5):17-24.
- [39] 刘铖,余秀兰,云如先.优绩主义陷阱的本土检视:从“上下有别”到“先赋应得”[J].社会,2024(4):26-56.
- [40] 谢爱磊,覃云云,刘群群.“后知后觉”与“随波逐流”——精英高校农村籍大学生就业能力管理的反身性叙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7):15-27.
- [41] 陶志欢.青少年“教育悖论”现象的分析与应对[J].青年探索,2024(5):102-112.
- [42] 刘永谋,白慧慧.人工智能时代青年情感教育变革[J].青年探索,2024(3):33-43.
- [43] 范涌峰,朱蕾屹,涂小庆,等.幼儿家长教育焦虑的实证分析与纾解路径[J].教育与教学研究,2024(4):116-128.
- [44] 吴尧,陈武元,程章继.地区贫富差距、家庭教育期望与共同富裕:微观证据与政策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24(8):11-23.
- [45] 刘胜枝.效率与爱情青年直播相亲背后的婚恋困境[J].人民论坛,2024(21):80-84.
- [46] 贾梦真,翁漫琳,马昱堃.自主生成式亲密关系:青年与人工智能伴侣的互动体验[J].青年探索,2024(1):55-67.
- [47] 晏青,郭京.青年群体的情绪危机与调适:网络“发疯文学”的批判性话语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3):49-59.
- [48] 李琼,费思琦,张璟垚.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的青年网民情绪演化机理研究——基于SEIR模型的数据仿真实验[J].青年探索,2024(4):30-43.
- [49] 辛艳艳,桂勇,郑雯.国家发展动力与青年群体认知:基于“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2009—2021)”的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24(5):18-26.
- [50] 付宇,李秀玫,桂勇.以己观世:理解当代青年思想观念与社会心态[J].青年探索,2024(1):68-78.
- [51] 杜世超.互联网使用类型与青年群体的未来阶层预期[J].青年研究,2024(2):14-26.
- [52] 张良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青年发展的影响研究[J].青年探索,2024(6):32-42.
- [53] 魏则胜,肖邦,桂冉.新媒体环境下青年价值观与政治认同的文化记忆建构[J].青年探索,2024(5):37-46.
- [54] 张志安,吕伟松.增强“虚拟现实”:AIGC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质生产力[J].青年探索,2024(5):25-36.
- [55] 张涛,王浩,郑健松.“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参与国青年群体的就业吗?——基于马克思主义就业理论与西方就业理论的准自然实验[J].青年探索,2024(6):100-110.
- [56] 郑长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青年逻辑——兼论中国青年使命与党的青年对外工作[J].青年探索,2024(1):5-19.

责任编辑:谢碧霞